

试论晚清三次重要的留学浪潮

杨彩娟

(陕西教育学院政法系, 陕西西安710061)

摘要: 晚清三十年间掀起的三次大规模留学浪潮, 虽然原因、特点各异, 但都为中国教育改革, 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 晚清; 留学教育; 高等教育发展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76(2007)03-0053-04

中国教育在晚清发生了巨大变化, 兴学堂, 废科举, 引新学, 革旧学, 教育改革与社会变革同步进行。在这场教育新旧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兴起的留学教育尤为耀眼。从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官费留美幼童到1911年第三批庚款留美学生止, 共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留学浪潮。由于当时留学教育受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 其发展具有自身的特点, 而且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尤其是教育改革意义深远。

一、办洋务, 留西洋(1872—1900)

中国人最早留学西洋接受正规高等教育始于容闳, 正如他自己所言:“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 实自予始。”^[1] 22 1837—1855年, 容闳留学美国。学成回国后,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实现其早已“规画大略于心中”的留学计划, 该计划的出发点是, “予意以为予之一身, 既受此文明之教育, 则当使后予之人, 亦享同等之利益”; 核心是要“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 23。经过近二十年的奔波, 容闳的计划得到洋务大员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1872—1875年, 清政府每年派出30名幼童赴美求学。虽然因种种原因, 这批官费留学生于1881年在大多数尚未完成学业的情况下全部撤回, 但却打开了中国人出国留学的大门。

留美幼童的成行固然与容闳的努力分不开, 但从根本上讲, 是当时中国的形势使然。鸦片战争后, 国人被迫“睁眼看世界”。同时, 随着外来势力的增强, 有很多夷务要处理, 更有抵御强敌的任务, 而中国苦于长期闭关锁国, 无论是看世界、处理夷务, 还是御敌, 都是困难重重, 主要的是缺乏人才。1859年, 郭嵩焘到天津办理夷务, 广求谙通夷语人才, 他说:“通市二百余年, 交兵议款又二十年, 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 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日御夷莫切于是。”^[2] 188 冯桂芬感叹道:“通市二十年来, 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甚多, 甚大尤者能读我近史, 于我朝章吏治、舆地民情类能言之; 而我都护以下之于彼国, 则懵然无所知。相形之下, 能无愧乎?” 因此他提倡“鉴诸国”^[2] 189。盛宣怀也深感“本大臣不谙文

语, 每逢办理交涉备尝艰苦”^[3]。为了解决人才问题, 清政府一方面筹建了一批新式学堂, 如京师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北洋大学堂、南洋大学堂等; 另一方面, 着手考虑派学生出洋求学, 1866年奕等呈折“奏请派斌椿等随赫德出国往泰西游历折”, 称:“外国情形, 中国未能周知, 于办理交涉事件, 终虞隔膜”, 因此奏请“派员前往各国, 探其利弊, 以期稍识端倪”^[4] 4-5。容闳的教育计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认可的。只不过洋务派大员支持留学, 目的是“使西人擅长之技, 中国皆能谙悉, 然后可以渐图自强”^[4] 86。曾国藩以政治大员的身份支持留学, 为兴起的洋务服务, 容闳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倡导留学, 以求中国学术的发展和国家的文明。尽管在目的上洋务派领袖与容闳有一定的分歧, 但在运作上, 容闳要借重于洋务派的政治势力, 而洋务派也需要容闳这样对于外国事务比较精通的人。

容闳的留学计划虽然夭折了, 却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留学高潮。幼童赴美学习后不久, 清廷就不断派学生前往欧洲学习, 其中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主。1875年船政学堂派出刘步蟾等5名学生, 赴英法学习; 1876年, 卞长胜等7人赴德国学习; 1877年又派出25名学生前往英法学习, 其中著名的有严复和马建忠。这是中国派往欧洲的第一批学生。此后船政学堂又于1882、1886、1897年分别派出三批学生共49人^[4] 258。赴欧学生和赴美幼童一样, 以军工、造船为主攻方向。到了1900年, 清政府因财政问题, 撤回了尚未归国的全部留欧学生。

这一阶段的留学运动, 带有很强的洋务色彩。从资金上来说, 倚重于洋务大员的支持, 主要为官派留学生; 从主攻专业上来说, 主要以军工为主, 旨在富国强兵; 留学重心在欧美, 这主要源于两次鸦片战争后, 中国深感交战国物质强大而前往学习; 从结果上说, 游美运动夭折, 留欧运动虽没遭致命的打击, 但后期学生学业大都不佳, 尽管如此, 这一阶段的留学浪潮给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造就了一批杰出的人物, 詹天佑、唐国安、严复是其中的佼佼者。

收稿日期: 2006-07-10

作者简介: 杨彩娟(1970-), 女, 陕西岐山人, 陕西教育学院政法系教师, 主要从事文化思想史研究。

二、行变法,留东洋(1886—1905)

洋务派富国强兵的设想因甲午战争的惨败而化为泡影,留学生用自己所学报效祖国,实现国富民强的愿望也一时落空,在新的危局下,掀起了留日浪潮。留日浪潮兴起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其一,留学欧美受挫折。留美幼童被撤回,除了愚顽的守旧派破坏外,19世纪80年代美国的排华运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无视1868年蒲安臣条约中有关中国学生留学美国权利的规定,拒绝容闳提出的选送一部分留美幼童中的优秀学生进入海军学堂学习的要求。这种情况在英法也同样存在,据巴斯蒂分析,留学国早期对中国学生的“协作精神”是中国学生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而1880年后,“无论在法国抑或在英国,那种认为欧洲人比一切亚洲民族都优越的感情相当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社会阶层,因此导致了对中国留学生友好态度的改变”^{[4]271},这是后期中国学生成就不大的原因。欧美国家对中国学生的排斥和歧视,使中国学生留欧美受挫,只好选择新的留学方向。日本,逐渐成了中国留学生的选择。

其二,日本“雄视东方”的吸引。甲午一役,对中国而言,意味着洋务实践的失败,对日本而言,意味着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雄视东方”的现实,使中国人决定暂时放弃以欧美为师,转而以日本为师,学习日本维新的经验,以图自强。据统计,从1896—1905年间,中国留日学生达万人之多^{[5]490}。在此期间曾出现的三个高潮年份(1896、1901、1905),都发生在日本军事上的辉煌之后。

其三,中国内忧外患加剧下的救急需求。“甲午丧师,举国震动”^{[6]97},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清廷大员开始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视教育为一切的根本。左宗堂指出,日本成就的取得主要在于日本人能“竞”,而“致此者有本有原,学校是也。学校者,人材所从出,而国家所以恃以为竞胜之具也”^{[7]116}。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留日高潮的兴起实际上是在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一些清政府大员为挽救时局而开的又一剂教育救国的“药方”。因此这批留日学生,除了学习自然科学外,更加广泛地涉猎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其中最热门的要算法政科,这种情况说明了留日学生的政治热情,而这种政治热情带有很强的救急色彩。

其四,与张之洞的倡导有关。甲午战后,张之洞积极倡导留学东洋,他认为留学“西洋不如东洋”。除了日本“雄视东方”的事实外,留日有很多好处,“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方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一中、东情势风俗相通,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4]14}。在张之洞的积极鼓吹下,自1896年,首批13名留日学生以非官方的形式派出,到1905年,留日学生共计达11227人^{[5]490},而当时张之洞供职的湖北籍的学生数目最多。

甲午后,学生留日运动呈现出新的特点。

其一,目的上的双重性。这一时期,留学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张之洞,甲午战后,在不得不面对洋务失败的尴尬

情况下,积极与维新派接触,并一度参与到变法活动中来;当变法初现失败端倪时,张之洞在思想上又趋于回复,重新站在洋务派的立场上。这反映在留学教育上,一方面需要培养大量政治人才,以适应变法的需要;另一方面,仍然不忘洋务,不忘维护清政府的统治,这就使得留学教育在目的上具有维新与守旧的双重性。

其二,结果上的失控性。尽管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清政府积极倡导留学日本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但事与愿违,大批官费留日学生及在此浪潮中出现的自费学生,在研究日本明治政治成功经验,学习介绍西方政治思想的过程中,出现了两股强劲的政治势力——维新势力和革命势力,无论哪一方,都是清政府当权派无法容忍的。后来,反满的革命思想日益盛行,这是留日运动最大的成果,但却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恐慌,而这也正是清政府后来收缩留日学生的根本原因。

其三,学业上的粗浅性。由于留日所需川资少等原因,除了清政府派出大量学生前往日本学习外,还有很多学生自费前往日本学习,这样就生源的整体素质来说,较前此的赴西洋留学稍差一些,他们到日本后,多数只是习日文或中学课程。另外在留日期间,日本一次次在华的军事行动,激起了很多留学生的反日情绪,他们往往学业未成就提前回国。因此这个留日高潮,虽然学生数量比较壮观,但总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

三、纷争起,游四方(1901—1911)

1901年至清朝灭亡的最后10年,是我国留学教育迅猛发展的时期。从留学国度看,以日、美为主,遍及英、法、德、俄、比、奥等国;从人数看,1905年,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剧增至8000人,迄止1911年,赴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总计达45387人^{[8]56},同一时期,赴欧美留学人数也有较大增长,其中留学美国者有489人^{[4]687}。此外,还有大量难以统计的自费留学生。成千上万学子骤然涌向海外求学,并非偶然,这是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一,各国纷争对中国的文化控制,客观上促进了留学事业的发展。庚子役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但列强不得不承认,“瓜分一事,实为下策”^[9]。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加紧对中国文化的控制,为此,他们展开了对中国教育,尤其是留学教育主动权的争夺。

最早提到争取中国留学生的是法国人。法国外长1867年致其驻北京公使信中指示,要在中国人“头脑中树立我们法国观念和文明的优越地位的最好机会,不是徒劳地一再炫耀武力和商业方面的成就,而是让他们来这里进行实地观察和研究。当他们走出国门,试图了解世界的时候,要把他们吸引到我们的国度……这是我们最好的政策”^{[4]260}。这位法国外长的指示有两层意思:一是对中国的军事和商业征服将是徒劳的,最好的政策是文化上的控制;二是对中国的文化控制,最好的办法是用法国的观念来武装中国人的头脑。此后,日意格把这一思想表达得更为精彩,他说:“自从在中国服务以来,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国家的人们引向欧洲……因为我感到,我们绝对无法和贸易商们

在海上进行商业竞争,所以,我们必须在吸引人才方面胜过他们。”^{[4]260} 尽管法国的有识之士最先敏锐地认识到吸引中国留学生在控制中国方面的意义,但法国政界对此表示淡漠。在第一批幼童赴美后,中国政府向法国提及派学生一事时,竟无人理会,福州船局监督只好承认:“美国新教徒的影响处于优越地位。”^{[4]260}

为了争夺东亚战略利益和控制中国文化的需要,日本政府从1898年就开始频频向清廷示好,提出派学生前往日本学习。1899年,矢野文雄称:“该国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藉悉中国需才孔亟。倘选派学生出洋学习,该国自应支其经费。”^{[4]325} 日本为迎合中国学生的需要,创办各类专门学校,如宏文学院、日华学堂等,并开设特殊课程。据统计,1906年在日本,中国学生超过50人的学校已超过50余间^{[8]58}。1907年8月,日本还应清政府要求,签订五校协议,规定自1908年起,15年内各校每年招生中国学生^{[4]346}。日本政府的各项措施吸引了大批的中国留学生。

中国学生的留日高潮,引起美国人的不安,他们开始意识到争取中国留学生的重要性。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致总统的一封信中,陈述了对中国进行教育投资的好处,他说:哪一个国家能成功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那一个国家便将由于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上、知识和商业的影响上获得最大可能的报偿;如果美国在35年前就成就这件事(一度看来似乎有可能),把中国学生的留学潮引向美国,并不断扩大这股潮流,那么,我们今天通过对中国领袖们知识上、精神上的支配,就该在各方面精心的安排下,最得心应手地控制中国的发展了。庚款留学就是美国争取对中国留学生教育控制的重大成就。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美国享有赔款中7%的份额,这远远超过美国应得的数目。我国驻美公使梁诚提出美国减收赔款要求,传教士明恩博等人乘机建议把剩余的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于发展教育事业,支持中国政府派遣学生留美的计划。为了重新控制中国留学生市场,1908年,这一建议获准通过。根据双方协议,决定自退赔之日起,前四年中国向美国每年派遣100名留学生,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续派50名。1909、1910、1911年,中国政府派出三批庚款留学生共180人(外加三名自费生),其中著名的有梅贻琦、胡适、竺可桢等人。美国这一政策吸引了大批中国留学生,也加强了美国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

除了法、日、美外,德、比、奥等国也纷纷改变策略,吸引中国留学生,参与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争夺,这种争夺,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留学事业的发展,对中国留学教育重心的转移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其二,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尤其是科举制的废除,在主观上为出国留学注入强大动力。科举制废除后,新式学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师资极度匮乏,因此,留学教育备受重视,各省大量选派官费留学生,学习师范、法政、实业技术等。实藤惠秀明确指出:“留日学生增加……还有一大原因……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废除。”^{[5]35} 另外,清政府还实行一系列鼓励留学的政策,促进留学事业的发展。罗兹曼

对此有很好的总结,他指出,清政府“对在外接受过全面教育的人将给予最高奖励,这些人包括在日本或西方留学长达3年以及在日本留学1年者。从那时起直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教育一直盛行向外国学习的做法”^[10]。

晚清留学教育,和其他所有应对时局的政策一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作为文化教育活动的留学教育,在晚清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留学作为异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方式,本应是双向的、平等的,但由于中国的弱势地位,使得这种文化交流是单向的、不平等的;晚清留学生虽然担负起了文化输入的重任,但却忽视了对中国的文化的输出;在文化输入方面,重视科教,而忽视思想。正如梁启超所叹: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全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就此点论,则畴昔之西洋留学生,深负有负于国家也^{[6]98}。

尽管如此,晚清的留学教育,在中国探索自身近代化的历程中,功不可没,为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贡献。

从学校创办来看,留学教育的发展推动国内兴办学堂的浪潮。为了选派庚款游美学生,创办肄业馆,1911年定名为清华学堂,后发展为清华大学;国内已有的学校纷纷以出洋留学作为办学的宗旨,1905年创办的复旦公学,以能给西方输送学生为办学宗旨。因此,早期创办的近代高等学校,如北洋大学、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和京师大学堂等,成了外派留学生的重要基地。如1909年庚款留美47名学生中,即有14名来自上海高等实业学堂。

从教育制度的引进来说,清政府在创办大学之初,主要学习日本大学的建制。为此,1898年,清政府专门派出以姚锡光为首的代表团赴日考察学制,姚锡光建议清政府不仅要练陆军、习专门,而且要发展小学和中学教育,否则是“无山林渊藪而求狩猎”也,同时还建议在学习西学的同时,不要忽视中学的学习^{[7]115}。此后,清政府或地方督抚多次派人到日本考查教育,主要有左宗棠之行、罗振玉之行、吴汝纶之行、缪荃孙之行、胡景桂之行等。在详细考察、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清政府颁定了一系列的办学章程,比如《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钦定高等学堂章程》(1902)、《钦定中学堂章程》(1902)、《钦定小学堂章程》(1902)等,都是按照日本的建制来办各级学校。民国成立后,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留学欧美学生纷纷回国,他们带回了欧洲各国的办学理念,中国高等教育从制度上开始受欧美影响。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负责制订《壬子癸丑学制》,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着手对北大进行改革。不管是在学制制定上,还是在高校整改上,蔡元培在教育宗旨上以德、法两国教育为取向,阐发了所谓大学的含义。

从课程建设来看,通过留学媒介,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大量传入国内高等学校课堂,正如舒新城所总结的:“留学生在近世中国文化上确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最大者为科学,次为文学,次为哲学”,“现在国内学校科学教师,科学用品与科学教科书者,亦莫不由留学生间接直接传

行而来。”^[11]另外,留日时期法政热的兴起,为中国日后高等教育中法政科的引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师资来看,由于留日时期,发展了大量的速成师范生,因此在晚清高校初创时期,在高等学校和管理机构任职的归国留学生以留日学生为主。民国时期,新建高校中任职的归国留学生以留美学生为主。

总之,晚清三次大规模的留学浪潮,虽与容闳、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积极倡导分不开,但从根本上说,是时势使然。一方面,中国在被动挨打中寻求出路,需要“师夷”,另一方面,列强为了争夺对中国文化的控制,纷纷制定政策,吸引中国学子,这就使得中国的留学教育带有很大的被动性,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尽管如此,晚清的留学教育对中国教育改革,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 [1] 容闳. 西学东渐记[M]. 徐凤石, 恽铁樵, 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 [2] 钟叔河. 面向世界丛刊[M]. 长沙: 岳麓出版社, 1985.
- [3] 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编委会. 上海交通大学校史[M]. 上

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6: 2.

- [4] 陈学洵, 田正平.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G].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 [5] 实藤惠秀.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 谭汝谦,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3.
- [6]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朱维铮, 导读.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7] 璩金圭, 唐良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G].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116.
- [8] 任达. 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 1898—1912[M]. 雷颐,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 [9] 范文澜. 中国近代史(上)[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47: 402.
- [10] 吉尔伯特·罗兹曼. 中国的现代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294.
- [11] 舒新城. 近代中国留学史[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9: 212-213.

O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ying abroad educ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YANG Cai-juan

(Politics and Law Department, Shaanx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thirty years of Qing Dynasty, the three tidal waves of studying abroad education were not only the result of the efforts of some people such as RONG Hong, ZENG Guo-fang and ZHANG Zhi-dong, but also the result of the situation. First, China must study other countries who have invaded her. Secondly, number of columns established corresponding policy one after another to attract Chinese students in order to scramble the go-aheadism of controlling Chinese culture. The education of studying abroad was development passively. Studying abroad educ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had produced many effects on China education.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studying abroad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education

(上接第52页)题,这是青年人在思想上、理想上出现迷茫和失落的结果,是十分令人担忧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加强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还要加强理想、道德教育和传统立志思想教育。有了志向,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挡住一切消极思想的诱惑和误导,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因此,从这一角度说,诸葛亮的立志思想是传统教育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

其次,诸葛亮立志思想的现代价值,还表现在它对我们当前培养教育年轻一代的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当前青年学生的思想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但学校环境的复杂和网络媒体的崛起对道德教育工作提出了挑战,不少年轻人胸无大志,沉湎于上网,甚至深陷网上交友、网恋不能自拔;网上的一些不健康的内容对学生思想产生了侵蚀,致使部分学生的价值取向发生紊乱,道德水平持续下降。这是我们民族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所面临的一大忧患。因此,加强年轻一代思想道德教育,特别是立志教育,引导他们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腐朽思潮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这就需要我们从立志思想教育为出发点,教育学生如何以自信面对未来的竞争,如何以淡泊的思想境界面对来自社会的不良

诱惑,使青年人成为自尊、自爱、自强、自省,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的社会栋梁之才。

最后,诸葛亮立志思想的现实意义,还表现在它能启发我们正确处理传统立志教育与当今思想教育的关系。中华民族有丰富的传统美德,也有优秀的德育传统,我们只有继承和发扬像立志教育这样的优秀德育传统,我们的德育工作才会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才能符合民族心理,才有丰富的教育资源,才会更有成效。所以,在学校德育工作中,要正确理解传统立志教育与理想道德教育之间的统一性。用立志教育的优秀传统丰富、充实、优化现代的理想教育,使之富于中国民族特色。

参考文献:

- [1] 诸葛亮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2] 朱子语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3] 王夫之. 张子正蒙注·中正篇·卷四[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4] 李. 四书反身录·卷四[M]. 上海: 上海扫叶山房, 1984.
- [5] 黄宗羲. 孟子师说·卷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